

1951
—
1978

中國文藝界

現象輯略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要避免悲劇重演，就得不忘記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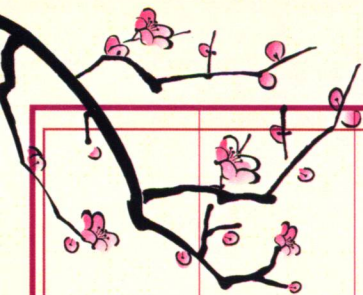
本書輯錄《〈紅樓夢〉研究》及胡適思想、

胡風「反革命集團」、

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

《海瑞罷官》等作為借鏡。

朱汝瞳 著



新銳文叢02 PG0714

新銳文創

INDEPENDENT & UNIQUE

1951-1978 中國文藝界現象輯略

作 者 朱汝瞳
主 編 蔡登山
責任編輯 陳佳怡
圖文排版 王思敏
封面設計 蔡瑋中

出版策劃 新銳文創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圖書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2-8227-5988 傳真：+886-2-8227-5989

出版日期 2012年3月 初版
定 價 23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1951
|
1978

中國文藝界 現象輯略

朱汝瞳 著



目 次

第一章	武訓及電影《武訓傳》	5
第二章	蕭也牧及其小說〈我們夫婦之間〉	17
第三章	《紅樓夢》研究及胡適思想	27
第四章	胡風「反革命集團」	45
第五章	「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	55
第六章	馮雪峰及其文藝思想	71
第七章	「有鬼無害」論	93
第八章	「中間人物」論	105
第九章	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117
第十章	「文藝黑線」	137
第十一章	批林批孔，評法批儒	153
第十二章	批《水滸》，批宋江	163
第十三章	批判「四人幫」，徹底否定〈紀要〉	177
後 記		185

4

第一章 武訓及電影《武訓傳》

電影《武訓傳》是由孫瑜編劇和導演，上海昆侖電影公司出品的。這部片子的醞釀和籌拍，最初是受陶行知先生的啟發。在抗戰中期，陶行知遭到了極大的困難，為了拯救因經費困難而陷於絕境的育才學校，他提倡「武訓精神」。1944年夏天，陶行知先生送了一本《武訓先生畫傳》給孫瑜。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反映了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要求，感動了孫瑜，於是就改編成《武訓傳》電影劇本。這部電影1948年就在重慶開始籌拍了。由於資金短缺和社會動亂，拍攝了三分之一便停了下來。編導孫瑜在北京參加第一次文代會期間，曾當面把自己要繼續拍完《武訓傳》的想法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的指示有三點：站穩階級立場；武訓成名後，統治階級便加以籠絡利用；武訓最後對興義學有懷疑。¹重新開機前，孫瑜把劇本拿到中宣部審查，也通過了。1950年底電影拍好了，由上海領導審查。舒同、馮定，甚至饒漱石也參加了，並且連連說「好、好」。饒漱石與孫瑜、趙丹握手表示祝賀。這一表態，一錘定音，《武訓傳》就是一部好影片了。1951年2月，《武訓傳》在上海、南京公映，獲得了熱烈反響。2月21日，孫瑜給周恩來寫信說，第一次文代會期間周恩來給他的三點意見，「都在影片裏寫到了」。文化部的沈雁冰部長和電影局袁牧之的局長都看了，希望周恩來能「於日理萬機的餘暇，賜以三小時的審映」。結果，當天晚上就讓在中南海放映，觀看的有周恩來、朱德等一百多人。看完之後，影片獲

¹ 孫瑜：〈影片《武訓傳》前前後後〉《中國電影時報》1986年11月29日。

得了不少掌聲，朱德還從老遠的座位走過來與孫瑜握手，說了一句「很有教育意義」；周恩來提了一個藝術處理方面的意見，也沒有多說別的。

影片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公映以後，絕大多數的文章持肯定態度。全國各報刊發表了四十多篇評論，贊稱影片的教育意義。著名教育家、北京師範大學董渭川教授說，他看了電影，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武訓這個名字，應該說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從武訓這個傑出的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許多傳統的卓越精神。」他認為在普及鄉村教育和培養愛國主義精神方面，武訓都是有教育意義的²。陶行知的弟子、上海教育局局長戴白韜先生說，教育工作者「更應該學習武訓那樣赤誠的始終如一不避任何艱苦困難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去教育工農³。還有人認為武訓是「千古一人」，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傳奇式英雄；也有人把武訓譽為「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幟」，也有人說武訓「站穩了階級的立場，向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鬥爭」，「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等等。特別是關心教育事業的同志們，都認為《武訓傳》的社會效果頗好。一些原來不安心教育的同志，看了電影《武訓傳》受到啟發，就安心了，表示要「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人民的教育事業」⁴在衷心的讚歎和景仰中，武訓被推崇得高入雲霄，此言不虛。

中南海那天晚上放映《武訓傳》，毛澤東沒有來觀看，幾天後，他調了片子去看。《武訓傳》對武訓的讚頌，主要集中在影片的主題歌詞上：「大哉武訓，至勇至仁。行乞興學，苦操奇行。一囊一鉢，僕僕風塵；一磚一瓦，積累成金。街頭賣藝，市上售歌；為牛為馬，捨命捨身。世風何薄，大陸日沉。誰啟我愚？誰濟我貧？大哉武訓，至勇至仁。行乞興學，千古一人！」這種莊嚴神聖的讚美詩貫穿了影片始終。

² 〈由教育觀點評《武訓傳》〉《光明日報》1951年2月28日。

³ 〈看了《武訓傳》之後的意見〉《新聞日報》1951年1月1日。

⁴ 孫瑜：〈我編導《武訓傳》的經過〉《縱橫》1997年第11期。

這令毛澤東很反感，和毛澤東的思路南轅北轍。中國革命的歷史、毛澤東本人的經歷，都反覆證明一個道理，即改變現狀，反對舊社會，只能首先用「武器的批判」。沒有人民革命的批判，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沒有人民政權的建立，文化建設高潮是不可能的。過去講武訓和陶行知精神，是因為他們畢竟為窮人做了好事，而現在全國勝利了再來宣傳，是不是宣傳改良主義？是不是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背道而馳？毛澤東覺得嚴重的是，公映後的一片叫好聲，說明了文化界的思想混亂到了何等的程度。1951年4、5月期間，《文藝報》第4卷第1、2期發表了江華〈建議教育界討論《武訓傳》〉、賈霽〈不足為訓的武訓〉、楊耳（許立群）〈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鄧友梅〈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開始批評《武訓傳》。《人民日報》5月15、16日轉載了上述文章，並在按語中指出，《武訓傳》是歌頌清朝末年的封建統治的擁護者武訓而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電影。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主要由毛澤東寫成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其中毛澤東撰寫的文字引錄如下：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麼人，向這些敵人投降並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讚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不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⁵

⁵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316、317頁。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還開列了報刊上發表的「歌頌《武訓傳》、歌頌武訓或者雖然批評武訓的一個方面，仍然歌頌過武訓其他方面的論文的一個不完全的目錄」，共44篇，都點了名。同一天在《人民日報》「黨的生活」欄目中還發表題為〈共產黨員應該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的短評。短評指出，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一場原則性的思想鬥爭，每個看過這部電影或看過歌頌文字的共產黨員，都應當自覺地行動起來，堅決徹底地與錯誤思想作鬥爭。同時還要求，凡是「歌頌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一律要作嚴肅的公開自我批評；而擔任文藝、教育、宣傳工作的黨員幹部，特別是與武訓、《武訓傳》及其評論有關的」幹部，「還要作出適當的結論」。於是中宣部電影局率先作出反應。5月23日向全國電影界發出通知，要求電影界人員「均須在各該單位負責同志有計劃領導下，進行並展開對《武訓傳》大討論，藉以提高思想認識，同時並須負責向觀眾進行教育，以肅清不良影響。並須討論結果及經過情況隨時報來局」。接著，中宣部、教育部、華東局等相繼發出通知或指示，指出：開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是一種全國性的思想運動。因此，必須把這場運動普及到每一個學校、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及每一個文藝工作者，並要聯繫實際徹底檢查自己。此後，各種報刊雜誌相繼發表了許多對武訓及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文章。有的文章毛澤東還親自動筆修改。如6月間，他審閱《學習》雜誌準備發表的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楊耳〈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時，就加寫了三段文字。在第一段中寫道：「武訓的中心事業是所謂行乞和辦『義』學。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腦筋的老好人，其實是一個騙局。武訓也許想過要為窮孩子辦學堂，但事實只能為

有錢人的子弟辦學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窮孩子進他那樣的學堂。被那些舉人、進士們掌握的學堂也決不會容許真正的窮孩子插足進去。武訓的『義』學，其實是不義之學。錢是殘酷地括來的。一是強要來的，武訓是一個吃五毒威脅善良人民逼其出錢的惡丐；二是放高利貸（利息三分）；三是倚仗官勢募捐。這三種錢的來源都是不正當的。」「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麼影響。後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在第三段中，他說：「武訓是一個富有機智和狠心的人，因為他成了『千古奇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頂的人們才被騙過。舊的反動著作家則將武訓的騙術有意描寫為『美談』，武訓的『我乞者不敢與師抗禮也』這件事，在『清史稿』武訓傳中也是大書特書的。」⁶從此，中央到地方的宣傳文化教育部門，大中小學校聞風而動，一場批判運動就此興起。7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范文瀾〈武訓是什麼人？為什麼有人要歌頌他？〉的文章。幾乎全面否定了武訓和電影《武訓傳》。

為了弄清楚武訓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毛澤東指示文化部、《人民日報》社等單位聯合組成了「武訓歷史調查團」。其調查團由13人組成，除負責人袁水拍和鍾惦棐之外，還有江青，其特殊身份在團裏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調查團在山東省堂邑、臨清、館陶一帶待了二十多天。帶有強烈傾向的調查，結論早已經有了的。幾萬字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共分五個部分：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二、武訓的為人；三、武訓學校的性質；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五、

⁶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374、375頁。

武訓的土地剝削。此〈調查記〉發表前，照例由毛澤東審改，每個部分都有毛澤東加寫或改寫的議論性段落，以進一步發揮他領袖的政治思想。共有十五處。根據〈調查記〉提供的材料，毛澤東給武訓定了性：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難道還不確切嗎？」毛澤東還寫了一段話作為最後論斷：在封建社會，「只有地主階級能夠壟斷文化，辦學校。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學文化的機會的。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教育學文化的必要。這是幾千年封建制度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並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係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在中國的解放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了。武訓生在滿清時代，他甘心為地主階級服務，以『為貧寒』的口號欺騙農民，而實際上為地主和商人辦成了三所學校，這是合乎封建社會的規律的。」⁷

自從《武訓傳》批判運動開展以後，那時文藝界、教育界人士都沒有思想準備，十分緊張，即使與這部電影關係不大的文藝界領導人，也作了自我批評。比如夏衍剛剛出訪回國的第三天，正在埋頭寫「出訪總結」，而就接到了周揚的指示，要他趕快回上海，寫一篇關於《武訓傳》問題的檢討，並且告誡夏衍，「要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藝界的領導」，要檢

⁷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402、401頁。

討。於是夏衍回上海召開了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會，在會上作了檢討，整理成〈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一文，寄給周揚看，周揚又請毛澤東看，毛澤東又親筆修改並加寫了一段話。該文章發表在8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周揚也作了檢討，他在《文藝報》第4卷第5期〈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的講話中說，「關於武訓和《武訓傳》電影的論戰，暴露了我們在思想工作和文藝工作上的一種嚴重狀態，就是我們許多同志在新的環境下政治思想上變得麻痺起來，開始失去一個共產黨員所應有的思想上的銳敏，失去對敵對的和錯誤的思想的辨別與批判的能力。」由是他在另一個報告中表示自己到現在還沒有發表批判《武訓傳》的文章，而感到「自己很難過」，「這種落後思想」是「不能容忍的」⁸。不光夏衍、周揚作了檢討，就是周恩來也作了自我批評。孫瑜和夏衍的回憶錄中都提到這事。1952年3月周恩來在上海參加電影工作者的茶話會時，問孫瑜，是否聽見了他在北京對《武訓傳》問題所作的檢討。第二天，周恩來在上海萬人大會上作報告時又說，第一次文代會期間，當孫瑜向他提出想拍《武訓傳》時，他只講了注意武訓這個人的階級出身問題，而沒有予以制止。後來看了影片，也沒有發現問題，所以對此他負有責任。他同時還談到，孫瑜和趙丹都是優秀的電影工作者，只是思想意識問題，千萬不要追究政治責任。然事實孫瑜、趙丹都被批判了。趙丹有四年不准拍電影。

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批判武訓和電影《武訓傳》運動，直接原因是這部影片存在著為執政黨難以容忍的政治意識形態。《武訓傳》在當時廣受歡迎所顯示出來的政治文化意識，與毛澤東所欲以建立的新文化想像有著嚴重的衝突。他把武訓辦義學的「奇舉」放在近

⁸ 《周揚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

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大背景和大走向中來考察，從而提倡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認識歷史和歷史人物。也就是說，在改造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世界觀的同時，推動文藝創作同前進的時代共命運。毛澤東需要利用武訓和電影《武訓傳》裏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觀點，向知識份子猛擊一掌，提醒他們注意中國革命的成功、中國社會的進步，決定的因素不是知識份子在反動統治下進行的所謂「文化教育」，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因此這個《武訓傳》批判運動有改造知識份子的用意，並實際地發展成為一場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他要清理知識份子的思想，達到政治認同。所以，毛澤東一開始就拒棄文化學術討論的思路，而引導為一場不由分說的蠻橫的文化批判運動，從而在剛剛起步的新中國文藝界，開了一個以文學批判為開路，去解決政治問題的不好先例，這種搞法的消極後果是明顯的。批判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運動時間並不長，只持續了三個月就結束了。運動期間發表了八十多篇批判文章，涉及的範圍和人群比較廣泛，甚至把陶行知先生也批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敵人」，但規模並不太大。8月8日周揚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對這次運動算作了一次總結。文章指出，需要就《武訓傳》的思想和藝術作系統的批判，說《武訓傳》用藝術的手法宣傳了反人民、反科學的歷史觀點。並認為「武訓的『義學』就正是迎合了當時封建統治者籠絡人心的反動政策，因而『義學』就成了他投降封建統治階級並使自己也爬上地主階級行列中去的政治資本。」周揚作出了「電影《武訓傳》主題的反動性」結論。這次批判運動直接導致了整風運動的開展，開始整頓文藝界知識份子的思想混亂。11月間中宣部召開了黨內主要文藝幹部十餘人的文藝工作會議，除了批判《武訓傳》

這樣的具體問題之外，一致認為，必須糾正文藝脫離黨的領導的狀態，徹底整頓文聯各協會的工作，改善對電影工作的領導；整頓文藝刊物，使之成為嚴肅的戰鬥的武器；對文藝界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展開有系統的鬥爭，迫使成百上千的文藝工作者作檢討，批判自己的作品，表示擁護毛澤東文藝思想。這次整風鞏固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導地位，形成了中國文藝界千百年來第一次思想清理和改造的奇異現象。

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今天回首來看，是非常片面的。毛澤東的秘書，50年代的中宣部副部長，80年代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同志，在1985年9月5日陶行知研究會和基金會成立會議上作了一番講話：「1951年，曾經發生過一個開始並不涉及而後來涉及陶先生的、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批評。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在這裏討論對武訓本人及《武訓傳》電影的全面評價，這需要歷史學家、教育家和電影藝術家在不抱任何成見的自由討論中去解決。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時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儘管這個批判有它特定的歷史原因，但是由於批判所採取的方法，我們不但不能說它是完全正確的，甚至也不能說它是基本正確的。這個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編導和演員，如孫瑜同志、趙丹同志等；他們都是長期在黨的影響下工作的進步藝術家，對他們的批判應該說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拍這部電影是在黨和進步文化界支持下決定和進行的。如果這個決定不妥，責任也不在他們兩位和其他參加者的身上。這部影片的內容不能說沒有缺點或錯誤，但後來加在這部影片上的罪名，卻過分誇大了，達到簡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從批判這部電影開始，後來發展到批判一切對武訓這個人物表示過程度不

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連環畫在內的各種作品，這就使原來的錯誤大大擴大了。」⁹

可見這次批判運動的危害是深重和久遠的。概括地說，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危害。首先，把文藝問題作為政治性的鬥爭問題。批判《武訓傳》電影，顧名思義，應該是一個純粹的文藝問題，原本可以自由探討。但運動並不著眼於文藝，卻規定要和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強調是一場政治性的鬥爭。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對全國勝利後形勢的估計和任務的規定應該說是正確的。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需要和資產階級作鬥爭，需要與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但這一鬥爭主要是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當然這一鬥爭有時也反映到文藝領域，但文藝有它自己解決問題的方式和規律，不能採用硬性的政治鬥爭方式。不應該為了急於印證對形勢的估計，用政治猜想當作預言的實現，抓住它開展一場與資產階級作鬥爭的大演習。其實，武訓的讚頌者不過是一般的知識份子，他們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文藝在這裏成了替罪羊。這種不好的做法往往被作為正面經驗上升到「規律」無窮盡的套用。政治上一有風吹草動，就到文藝中去找羔羊，從文藝開刀；或者計畫開展一個什麼鬥爭，也拿文藝當石頭，拾起來擲過去，投石打鳥。中國當代的政治鬥爭一個接著一個，文藝也就不斷地被開刀和丟掉，積重難返。這種慣性事態的延續，看著文學思潮的錯誤引導，令人心痛。其次，強化了文學主題的單一性。解放初期，本來在強調歌頌工農兵方向的主題和題材，已有忽視甚至排斥其他主題和題材的明顯苗頭，而這次氣氛緊張的《武訓傳》批判運動對此又有所助長。有的批判文章把影片的編導孫瑜說成是思想反動，有意識「用武訓這具僵屍欺騙中國人

⁹ 《黨史通訊》1985年第12期。